

浅谈中国的语言使用意识与语言评价

——以重庆大学生为例——

宮 本 大 輔*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和 80 多种语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各种语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形成一个国家，发展以及普及科学技术上都会成为很大的障碍。为此，中国政府 1956 年制定了普通话¹，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同时颁布实施了很多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 年）、《义务教育法实施详细》（1992 年）、《教育法》（1995 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等²来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工作。2000 年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通话制定为中国的公用语言。同时中国政府要求教师、主持人、演员、国家公务员等必须会说一定等级以上的普通话³。一系列的使得中国的普通话使用者大增。

* 福岡大学言語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外国語講師

¹ 普通话在 1956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林 2000：12 页）

² 关于各个法律的跟推广普通话有关的内容，可以参考宫本（2005）。

³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 19 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进行培训。”（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课题组 2004：186 页）

笔者曾经在宫本(2007)、宫本(2008)、宫本(2009a)、宫本(2009b)、宫本(2009c)和宫本(2010)里讲述过北京、天津、上海和杭州四个城市的大学生怎样看待普通话和各种地方方言,同时也分析了各地被试在各种场合如何取舍普通话和自己的方言。不过笔者上面所提到的文章都是在中国东部—所谓沿海地区实施调查的结果。中国国土辽阔,只看沿海地区的话,是不可能全面把握中国人的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的。当然也应该考察中国内陆的状况。在众多中国内陆城市中,重庆是最大的城市之一,如果在重庆实施调查,其结果应当颇具代表性。本文就介绍笔者2010年在重庆实施的重庆在读大学生(简称: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以及语言评价调查。

本文首先考察重庆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场合如何选择语言(普通话和重庆话)及普通话在重庆的渗透程度。其次分析重庆大学生分别如何评价普通话和重庆话⁴。最后考察一下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2 研究背景

本文的内容涉及语言使用意识(attitudes toward code-switching)和语言评价(language evaluation)。本章简单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先行研究。

首先,语言使用意识研究的对象是:人们怎样理解自己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行动(真田et al., 1992)。很多先行研究都是分析双语兼用者怎样理解自己的语言使用因情景(setting)、话题(topic)和对话者(interlocutor)而改变的。通过先行研究,我们知道语言使用在多语言地区受到对话者、情景和话题的影响。绝大部分研究都表明在正式场合跟亲密度低的对话者说话时,标准变

⁴ 重庆话是属于西南官话的方言之一,跟普通话比起来,变调规则更复杂,声调的调值也跟普通话不太一样。除了这些声调上的特征以外,还有几个声母的同化现象,如:l→n(侯1997:49-57)。

体的使用频率高；在轻松的场合跟亲密度高的对话者说话时，标准变体的使用频率低。

譬如，Burhis&Sachdev (1984)在加拿大哈密尔顿实施以English Canadian (简称：EC)和Italian Canadian (简称：IC)的学生为对象的语言使用意识调查，分析被试在9种场合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使用情况，指出EC在所有的场合都仅用英语，IC在所有的场合都使用双语，而且英语比意大利语多用。另外，Lawson&Sachdev在突尼斯和英国对住在孟加拉社区的人实施的语言使用意识调查表明被试会因情景、话题和对话者而变换语言(Lawson&Sachdev2000；Lawson&Sachdev2004)。

关于中国人的语言使用意识的研究则有中国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这是中国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从1999年到2001年以住在大陆、拥有正常语言能力的15到69岁的中国人为对象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样本共有47万5千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定了5种场合⁵来调查中国人的语言使用状况，分别从民族、居住地、性别、年龄段、职业、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出示各地的说普通话或说汉语方言的比例。其调查结果表明：在每种场合中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最高的基本上仅是北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四个省市。除了西藏、新疆等一部分自治区的人在每种场合中多用民族语言以外，其他省市区的人在每种场合中都多用汉语方言。另外，陳(2005)在福州、广州和香港实行调查，分析语言使用意识和普通话的语言能力以及地方普通话的特征，考察中国地方的普通话化问题。陳(2005)的结果表明：在福州普通话的渗透度很高，除了市场和家庭，其他各个场合的普通话使用比例都超过50%。在广州普通话的渗透度不太高，除了一部分跟外省人说话的场所用普通话以外，其他的大部

⁵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设定的场合是：“在家”、“在当地集贸市场买东西”、“在当地医院看病”、“在当地政府部门办事”和“在单位工作时”。

分场合中都多用广东话。在香港的各个场合中，普通话、广东话、英语都出现，但是除了在一部分跟大陆人说话的场合中用普通话的比例稍高以外，其他的大部分场合中都用广东话或兼用广东话和英语。

其次，语言评价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对某种语言形式、语言系统以及语言行动拥有的评价(真田et al. 1992)。跟语言评价有关的研究大分为两种：(1)语言变体和说话者特性之间的关系；(2)如何看待语言本身。

属于(1)的研究以运用配对变语法(matched guise technique)⁶为主流。根据先行研究，我们知道标准语言与说话者的知性、外貌、自信、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等特性之间正相关。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Lambert et al. (1960)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进行的调查。Lambert et al. 让被试听用英语和法语朗诵的文章，让他们评价说话者的形象。Lambert et al. 指出在大部分评价项目(如：“个子高，外貌，知性，信赖，体贴，有野心，有个性”)上英语的评价比法语高。法语的评价高于英语的只有“幽默”这个评价项目。另外，Giles (1970)让被试听用13种英语变体朗诵的文章，让他们评价说话者的形象。Giles指出在感觉(aesthetic content)，传达信息(communicative content)和社会地位(status content)上，评价最高的是标准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Giles (1971)把焦点放在标准发音、南威尔士音和萨默塞特音上，分析语言评价。Giles指出标准发音跟其它地区变体比起来，在“外貌，野心，知性，自信，果断力，勤奋”等评价项目上的评价更高。最近在日本和中国运用配对变语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可以岡本(2001)和高et al. (1998)为例。岡本(2001)在名古屋做调查，考察名古屋话的语言评价。岡本在文章中指出，在“活动性”和“外貌”等方面，方言的评价比标准日语高，而在“说话方式”和“知性”等方面，标准日语的评价

⁶ 首先把同一个说话者用两种语言变体朗诵同一个内容的文章听给被验，然后让他们评价说话者的形象(真田 2006 : 170, 翻译由笔者)。

比方言高。高et al. (1998)在中国的3个城市(北京、广州以及香港)做调查⁷, 让各地被试大学生评价4种语言(广东话、英语、普通话以及带广东话口音的普通话)。高et al. (1998)的调查结果表明, 所抽出的3个因子(“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人格”)当中, 在社会地位因子和经济地位因子上得到最高评价的是英语, 在人格因子上得到最高评价的是带广东话口音的普通话。

属于(2)的语言评价研究以不让被试听到声音的方法为中心。譬如, 井上(1977a, 1977b)让被试评价日本各地方言(札幌话、东北话、东京话、关西话等), 指出日本方言可用3个因子评价即: 知性、情性以及乡愁性评价。还有, 冲(1986)在大阪做同样的调查, 让被试评价自己方言(大阪话)、其他方言(京都话、九州话、东北话和东京话)以及标准日语。关于中国方言评价的研究有宫本(2007)、宫本(2008)、宫本(2009a)、宫本(2009b)以及宫本(2009c)等一系列研究。宫本(2009c)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杭州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各地的被试对普通话、自己方言以及其他地方方言的评价, 也指出汉语标准变体(普通话)和地方方言的评价有北方性评价和南方性评价。

下面介绍一下跟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的关系有关的研究。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很少。但可以举伊藤(1993)为例。伊藤(1993)把分数赋予定性数据, 将之作为定量数据来分析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之间的相关性, 指出喜欢、轻快和柔软等评价项目跟方言的使用意识有关。伊藤(1993)所用的赋予定性数据分数的方法虽然也能在其他的文章(陈, 2005; 薛·陈, 2012)里看到, 但是对这种方法一直存在争执。表示赞同的有岩佐·宿久(2009)等, 指出通过定性数据的量化可以运用统计处理。表示反对的有山际·田中(1997)等, 指出因为顺序数据没有间隔, 所以算出的平均分数似乎意义不大。另外, 也有研究主张使用5点尺度量表法, 直接把顺序数据看做定量数据(萩

⁷ 更详细地说, 高et al. (1998)用的方法是配对变语法的一种变体“言语变体法(Verbal guise technique)”。

生田·繁枿, 1996)。因此, 笔者在本文没用这些方法, 而用别的方法来尝试把定性数据换算为定量数据。

3 调查概要

本章介绍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调查方法以及问卷内容。

本次调查是以 200 名重庆文理学院的在读大学生为对象, 按照集合法进行的。其中在重庆出生的学生有 120 名(男性: 58 名, 女性: 62 名), 因此本文以这 120 名学生为分析对象进行讨论。

问卷内容分为 2 个部分: 语言使用意识部分和语言评价部分。在语言使用意识部分, 为了测试他们在哪种场合使用哪种语言, 笔者准备了 7 种场合: 1 在家跟家人说话, 2 购物时跟店员说话, 3 在学校跟同学说话, 4 在校外跟同学说话, 5 跟朋友说话, 6 上课时跟老师说话, 7 下课后跟老师说话。

在语言评价部分, 为了测试被试怎样评价普通话、自己方言以及其他方言, 笔者准备了 9 个评价项目: 1 高雅, 2 亲切, 3 柔软, 4 豪爽, 5 细腻, 6 好听, 7 实用, 8 酷, 9 喜欢。每个评价项目都按照 5 点尺度量表法准备 5 个选择项, 以高雅为例的话, 其内容如下: 5 非常高雅, 4 比较高雅, 3 一般, 2 不太高雅, 1 不高雅。笔者把 5 分-1 分的分数赋予 5 个选择项进行统计。

调查对象的语言视调查地周围的语言环境而定, 一共有 19 个, 如: 普通话、北京话、上海话、江西话、湖南话、福建话、广东话、安徽话、四川话、广西平话以及重庆话等。本文把焦点放在普通话和重庆话上, 详细叙述重庆大学生怎样看待普通话和重庆话。

另外, 分析定量数据时, 使用了 IBM SPSS statistics22 统计软件。

4 结果与考察

4.1 语言使用意识

本节讨论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请看图 1, 图 1 是问卷调查结果

中所显示出的被试在各个场合使用何种语言。把7种场合按学生回答在各个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此后称为普通话使用比例;另外把学生回答在各个场合使用重庆话的比例称为重庆话使用比例)降序排列如下:

场合6 > 场合7 > 场合3 > 场合2 > 场合4 > 场合5 > 场合1

在笔者设置的7种场合中,普通话使用比例最高、重庆话使用比例最低的是场合6(普通话使用比例:90%,重庆话使用比例:9.2%)。场合6的情景是“上课的时候,跟老师说话”。一般来说,上课时间是学生比较紧张的地方,而且老师是学生要正式说话的长辈。所以,对被试来说,场合6是,在笔者设置的7个场合中,正式程度最高的场合。下面请看场合7“下课后跟老师说话”的语言使用意识(普通话使用比例:51.7%,重庆话使用比例:44.2%)。虽然普通话使用比例比重庆话使用比例稍高,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即对话者一样,可情景不一样的话,也会影响到被试的语言使用意识。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明在场合3“在学校跟同学说话”和场合4“在校外跟同学说话”中的语言使用意识上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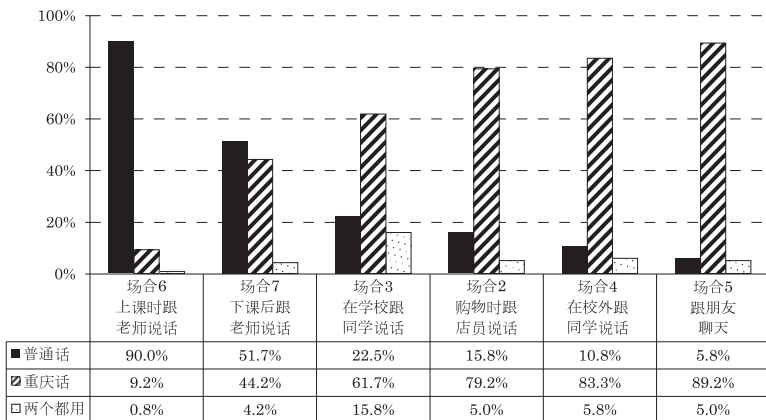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在笔者设置的7种场合中,普通话使用比例最低、重庆话使用比例最高的是场合1(普通话使用比例:1.7%,重庆话使用比例:98.3%)。场合1的情景是“在自己的家,跟自己的家人说话”。一般来说,家是人最能放松的地方,家人是人最能随意沟通的对象。所以,对被试来说,场合1是,在笔者设置的7个场合中,正式程度最低的场合。

可见,被试的语言使用意识会受到场合的正式程度和对话者的影响。场合的正式程度越高,标准变体的使用比例越高;场合的正式程度越低,地方方言的使用比例越高。这个结果跟其他的大部分研究结果是有一致性的。

但是,如果更详细地分析,则又可得出一些不同之处。从宫本(2010)得出的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4个城市的语言使用意识可以看出语言使用意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北京型,指普通话使用比例从场合6到场合1都没有很大的变化;另一种是上海型,指普通话使用比例从场合6到场合1逐渐

下降⁸。在天津和上海的调查结果显示两地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都有跟上海型相似之处。但是重庆大学生的普通话使用比例除在场合6占90%，在场合7占51.7%以外，都很低(22.5%—1.7%)。其实场合7的普通话使用比例跟天津、上海、杭州的比起来也并不高。普通话在被试的语言生活中，可以说是一种学校语言，重庆话则是通用语言。为此，笔者认为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不同于上面提到的两种类型，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类型，我们可将之称为重庆型。

图1 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



本次调查的120名被试中，男性58名(约48.3%)，女性62名(约52.7%)。表1是男性女性在各个场合中普通话的使用比例。除场合6和场合7中女性的普通话使用比例比男性稍高以外，其他场合的男性的普通话使

⁸ 宫本(2010)指出的普通话使用比例(北京)如下:场面6(73.7%)，场面2(73.3%)，场面7(70.9%)，场面3(70.4%)，场面4(68.4%)，场面5(67.2%)，场面1(66.0%)；普通话使用比例(上海)如下：场面6(99.4%)，场面7(91.3%)，场面3(67.1%)，场面2(49.7%)，场面4(37.3%)，场面5(29.8%)，场面1(6.8%)。

用比例都比女性高。笔者运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分析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表明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在性别上没有有意差。这个结果不同于以往的先行研究,可以说是本文的成果之一。

表1 普通话使用比例的性差

	场合6 上课时跟 老师说话	场合7 下课后跟 老师说话	场合3 在学校跟 同学说话	场合2 购物时跟 店员说话	场合4 在校外跟 同学说话	场合5 跟朋友 聊天	场合1 在家跟 家人说话
男性	88.2%	51.0%	27.5%	19.6%	11.8%	7.8%	2.0%
女性	91.3%	52.2%	18.8%	13.0%	10.1%	4.3%	1.4%

4.2 语言评价

本节讨论重庆大学生如何评价普通话和重庆话。首先,笔者运用因子分析(最大似似法、最优斜交(promax)转轴法)分析了被试对普通话和重庆话的评价。由于得出的结果里面“好听”和“实用”这2项评价项目对所抽出的2个因子都有因子贡献,因子间相关性也很低,意义不大。因此,笔者把这2项评价项目去掉,再运用因子分析(最大似似法、正交的最大方差(varimax)转轴法),得出表2。如表2所示,我们得出了2个因子:因子1和因子2。属于因子1的项目有4个(酷、豪爽、喜欢、亲切),命名为动性因子。属于因子2的项目有3个(柔软、细腻、高雅),命名为静性因子。

其次,以普通话和重庆话为固定因子对上述两个因子做了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略称ANOVA)。结果表明被试对普通话和重庆话拥有的评价之间有意差(因子1: $F(1, 207)=88.012, p<.001$; 因子2: $F(1, 207)=38.579, p<.001$),也说明在因子1“动性因子”上重庆话的评价比普通话的高,在因子2“静性因子”上普通话的评价比重庆话高。

另外,笔者对被试的语言评价运用ANOVA分析其性差,结果显示被试

的语言评价没有性差。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对普通话和重庆话的评价从何而来。决定语言评价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内在因素，即语言本身拥有的物理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二是外在因素，包括对以该语言为使用语言民族的感情，跟该语言使用者的接触经验，对风俗和社会的向往，对文学作品的憧憬等(堀井 1988)。

关于普通话本身的语言特征，即堀井所说的内在因素，众所周知，不再赘述。关于重庆话本身的语言特征，笔者已在注释 4 里提过：重庆话属于西南官话的方言之一，跟普通话比起来，变调规则更复杂，声调的调值也跟普通话不太一样(侯，1997)。

决定普通话评价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对普通话的评价里凸显出来的是因子 2—静性因子。构成静性因子的项目是“柔软、细腻、高雅”。普通话是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也是中国政府要求从事教员、主持人、演员、国家公务员等职业人员必须使用语言，同时又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模仿、学习的语言。也可以说普通话是非常正式的语言，其规范性很强。因此，笔者认为普通话的静性因子评价：“柔软、细腻、高雅”来自于普通话的正式性和规范性。

下面我们来看看重庆话评价的外在因素。考察决定重庆话评价的外在因素时不得不提到：《读城记》⁹。易中天在这本书里把中国的一些城市按照其特征男性化和女性化。在该书中也提到重庆时说：“重庆的性格很复杂。作为南方城市又在水边，重庆似乎应该是“女性的”。何况，还有重庆是“徐娘半老”的说法。但是，作为西南山城，它又和贵阳一样，有着男性的特征(p.35)”。在《一放水土一方人》¹⁰里也有跟重庆有关的记载：“你硬，我更硬，你干燥，我更干燥，这就是大多数重庆人的特点：欺硬怕软。至于它的文明

⁹ 易中天写的随笔著作(1997年初版)。笔者看的是2000年出版的修订本。

¹⁰ 董维涛2003年写的随笔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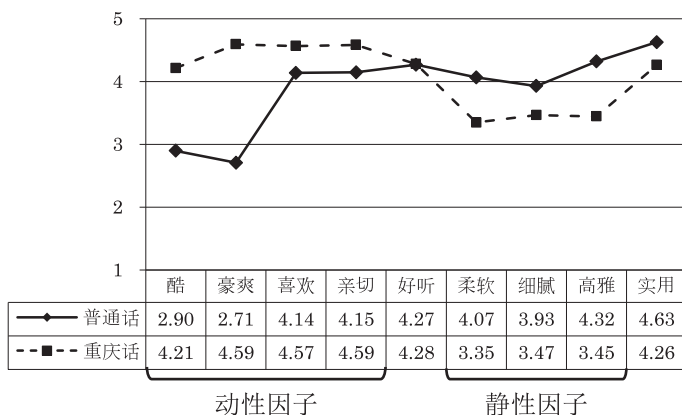
程度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重庆人热情、耿直、敢作敢为；有的人说重庆人缺乏理性(305页)”。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怎样看待重庆和重庆人。

参照上述见解我们再来看看本次调查里所抽出来的2个因子：动性因子和静性因子。对重庆话的评价里凸显出来的是因子1—动性因子。构成动性因子的成分是“酷、豪爽、喜欢、亲切”。对被试来说，重庆话是母语，再加上重庆是他们生长的故乡，他们从小就在用重庆话生活。所以他们觉得重庆话更“喜欢、亲切”是理所当然的。那“酷、豪爽”的形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认为这些评价与上面所提到的“重庆的男人味”和“重庆人的欺硬怕软、敢作敢为的性格”密切相关。

表2 因子分析结果(最大似法·正交的最大方差转轴法)

	因子1	因子2
[因子1：动性]		
8 酷	.880	-.032
4 豪爽	.824	-.219
9 喜欢	.688	.192
2 亲切	.533	.237
[因子2：静性]		
3 柔软	-.002	.849
5 细腻	.177	.808
1 高雅	-.005	.717

图 2 重庆大学生的语言评价



4.3 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的因果关系

本节探讨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由于语言使用意识是定性的，语言评价是定量的，因而无法直接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为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将语言使用意识换算成定量数据。按照各个被试的普通话或者重庆话的出现率算出语言使用分数(表 3)。

$$\text{语言使用分数} = \frac{\text{普通话(重庆话)的出现率}}{\text{场合总数}}$$

用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如果是普通话使用分数，其分数越靠近 1，普通话使用比例越高；如果是重庆话使用分数，其分数越靠近 1，重庆话使用比例越高。

表 3 被试的语言使用分数¹¹

普通话	重庆话
.284	.664
(.184)	(.212)

根据上面的结果我们来看看语言使用意识和语言评价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对男性女性语言使用分数和语言评价(抽出的2个因子:动性因子和静性因子)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重庆话评价(女性·动性因子)对重庆话使用分数有有意的正面效果(表4),即被试(女性)里面对重庆话(动性因子)拥有高评价的更多使用重庆话。但很遗憾在其他的搭配(普通话评价(男性/女性)和普通话使用分数、普通话评价(男性/女性)和重庆话使用分数、重庆话评价(男性/女性)和普通话使用分数、重庆话评价(男性)和重庆话使用分数)之间没能发现有意的效果。

表 4 以重庆话使用分数为被说明因子的多元回归分析(女性·重庆话评价)

说明因子	β	r
动性因子	.34**	.33**
静性因子	-.03	.05
R^2	.11*	
Adj. R^2	.08*	
N	63	

**p < .01, *p < .05

¹¹ 表3里的数值指平均,()里的数值指标准偏差。

5 结语

本文对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意识、语言评价以及语言使用意识与语言评价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3个结论：一，重庆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不同于其他沿海地区。对他们来说普通话只是学校语言，重庆话才是通用语言。二，重庆大学生的语言评价中存在两个因子：动性因子和静性因子。在普通话评价上静性因子比较高，在重庆话评价上动性因子比较高。三，尽管仅在重庆话评价(女性·动性因子)对重庆话使用分数运用的多元回归分析上凸显，但是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语言评价与语言使用意识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至于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因果关系又该如何去计算和鉴定则还需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谢辞

在此对实施问卷调查时给予我帮助的刘海燕老师(中国四川师范大学)与参加调查的学生们以及写本文时很耐心地帮我纠正汉语的温琳老师(丽泽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陳於華(2005). 中国の地域社会と標準語—南中国を中心に 三元社
- 萩生田伸子・繁柝算男(1996). 順序付きカテゴリカルデータへの因子分析の適用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注意点 心理学研究, 67, 1-8
- 藤鳴・陳於華(2012). 在日中国人子女の言語使用意識とエスニシティーある中華学校で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から— 愛知大学 言語と文化, 26, 31-49.
- 堀井令以知(1988). 語感・言語意識・言語感覚 日本語学, 7(8), 4-10.
- 伊藤隆(1993). 方言と標準語—場面による使い分けとことばのイメージ

-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人間, 2, 1-12.
- 井上史雄(1977a). 方言イメージの多変量解析(上)言語生活, 311, 82-91.
- (1977b). 方言イメージの多変量解析(下)言語生活, 312, 82-88.
- 岩佐英彦・宿久洋(2009). 授業評価・市場調査のための「アンケート」調査・分析ができる本 秀和システム
- 宮本大輔(2005). 言語危機からみる中国の共通語政策 人文研究, 156, 137-161.
- (2007).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評価—浙江省の大学生を例として— 人類文化研究のための非文字資料の体系化, 4, 93-202.
- (2008). 北京における言語評価 神奈川大学 21世紀COE『若手研究者研究成果論文集』, 137-151.
- (2009a). 天津人大学生の言語評価 人文研究, 167, 135-167.
- (2009b). 上海人大学生の言語評価 人文学研究所報, 42, 33-50.
- (2009c). 中国人の言語評価—北京・天津・上海・杭州の大学生を対象に— 社会言語科学, 11(2), 55-68.
- (2010). 中国人大学生の言語態度 非文字資料研究, 6, 119-136.
- 岡村真一郎 (2001). 名古屋方言の使用が話し手の印象に及ぼす影響 —Matched-guise technique を用いて—. 社会言語科学, 3(2), 4-16.
- 沖裕子(1986). 方言イメージの形成 国文学, 63, 158-172.
- 真田信治(編)社会言語学の展望 くろしお出版
- 真田信治et al. (1992). 社会言語学 おうふう
- 山際勇一郎・田中敏(1997). ユーザーのための心理データの多変量解析法 —方法の理解から論文の書き方まで 教育出版

- 董维涛(2003).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工人出版社
- 高一虹et al. (1998). 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434-448.
- 侯精一主編(1997). 成都話音档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林焘(2000). 普通话和北京话 语文出版社
- 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课题组编(2004). 推广普通话文件资料汇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 易中天(2000). 读城记(修订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资料 语文出版社
- Bourhis, Richard Y. & Sachdev, Itesh. (1984). Vitality perceptions and language attitudes : some Canadian data.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97-126.
- Giles, Howard. (1970). Evaluative reactions to accents. *Educational review*, 22, 211-227.
- (1971). Patterns of evaluation to R.P., South Welsh and Somerset accented spee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 280-281.
- Lambert, W. et al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1), 44-51.
- Lawson, Sarah. & Sachdev, Itesh. (2000). Code switching in Tunisia : attitudinal and behavioural dimens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2, 1343-1361.
- (2004). Identity,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s. Some Sylheti-Bangladeshi data from London, UK.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3 (1), 49-69.